

屈原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在热爱祖国、亲民爱民、保持节操、
砥砺品性、以物言志等具体层面，
其中爱国主义是屈原精神的核心。

屈原精神的 价值与传承

张立群
韩隆福
主 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屈原精神的 价值与传承



张立群 韩隆福 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原精神的价值与传承 / 张立群, 韩隆福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4

ISBN 978 - 7 - 5201 - 4316 - 5

I. ①屈… II. ①张… ②韩… III. ①爱国主义教育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28286 号

屈原精神的价值与传承

主 编 / 张立群 韩隆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周志宽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39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316 - 5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屈原精神是屈原人性的升华，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热爱祖国，“可与日月争光”的美政抱负；二是亲民爱民，“相观民之计极”的民本意识；三是保持节操，“虽九死而犹未悔”的斗争决心；四是砥砺品性，“余独好修以为常”的自修鞭策；五是以物言志，“山中人兮芳杜若”的浪漫情怀。其中，爱国主义是屈原精神的核心。屈原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巨大的感召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在不同场合，习总书记多次提到屈原，赞叹其心忧家国、情牵百姓、勇于探索、清正高洁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精髓，并几度引用屈原诗歌中的名句来阐述思想，寄情言志。

2014年9月3日，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引用了屈原诗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屈原《九歌·国殇》），强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铁骨铮铮、视死如归，奏响了气壮山河的英雄战歌。涌现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正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引用屈原的诗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离骚》），勉励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引用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离骚》）



的诗句，告诫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永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继续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经受考验，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2018年5月28日，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引用屈原的诗句，强调我们必须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离骚》）的豪情，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的制高点。

2018年6月13日，习近平在山东考察时再次引用屈原诗句。特别提出搞好国有企业，就要有那么一股劲儿，正像屈原讲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要改革，抱残守缺不行，改革成功，就能变成现代企业。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一鼓作气，一气呵成，一以贯之，朝着既定的目标奋勇直前。

当下，我们正处于伟大的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前进，还要进行伟大斗争，开启伟大征程，实现伟大目标，都需要我们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神养分，不断焕发良好的精神状态。而屈原的伟大精神，为我们提供了精神食粮滋养，值得发扬光大。

一 屈原出生寻踪

屈原故乡“汉寿说”的提出及其几个主要依据	韩隆福 / 003
论楚国的屈氏家族和屈原的故乡	韩隆福 / 023
论屈原与洞庭湖乡的关系	韩隆福 / 039
关于屈原故里研究的思考	
——兼谈屈原出生“郢阳说”	韩隆福 / 047
屈原的出生地在湖南汉寿	黄露生 / 054
屈原故乡之谜与汉寿出土文物	黄露生 / 066

二 屈原文化资源发掘

从历次封号看屈原对道教文化的影响	梁颂成 / 075
龙膺与湖湘屈原文化	梁颂成 / 082
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考述	梁颂成 / 090
常德文化名城建设中的屈原民俗及其保护	张文刚 李云安 / 098
试论屈原流放时期的传说及其传承场	李云安 / 111
屈子冤魂终古在楚乡遗俗至今留	
——浅论荆楚民间传承的屈原民俗文化	李云安 / 119
易顺鼎对于屈原文化的接受与传承	傅利民 张立群 / 126



三 屈原精神传承

屈原价值的历史发现及现代重估	方 铭 / 139
屈原的乡国之情与人格魅力	郭建勋 / 153
国魂、橘魂与屈原精神	龚红林 / 163
论屈原的爱国情怀及其当代价值	龚红林 余三定 锺兴永 / 173
论屈原精神力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价值	
——兼论毛泽东对屈原精神的肯定	龚红林 何 轩 鲁 涛 / 188
屈原求索精神及其现代解读	都春屏 / 198
论屈原的独醒精神及其时代意义	任 远 / 206
试论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内在渊源	陆跃升 / 213
理解屈原	张立群 / 218
以距离仰望屈原	张立群 / 222
屈原的家国梦	张立群 / 226
后 记	230

一 屈原出生寻踪



屈原故乡“汉寿说”的提出及其几个主要依据

韩隆福

屈原创作了与日月争辉的《楚辞》，成为中国最早的伟大爱国主义诗人。由于秦朝焚书坑儒的错误政策，使先秦的典籍大多葬身火海，有关屈原的记载极少。宁受宫刑也要完成《史记》巨著的司马迁，在撰著《屈原列传》时，因缺乏资料而留下了屈原出生地的空白。司马迁在《春申列传》中可以确定春申君黄歇为楚国黔中人，但在《屈原列传》中只能将屈子确定为楚人。可屈原的出生和悲剧却使司马迁找到了知音，屈原也因得到了司马迁这样相同遭际知音的手笔，才使屈原的品格得到空前的升华。因而，《屈原列传》不仅树起了屈原动人心魄的爱国形象，而且成为纪传文学的千古绝唱。唯其如此，使一些后世学者都力图在屈赋的研究中，找到屈原的出生地，出现了屈原故里秭归、江陵等多种说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地下文物出土，超过历史文献的记载，把楚史文化研究推向从未有过的高潮，更带动了屈原文化研究。一些学者在屈原研究的深入中，把地下出土的文物与文献资料结合起来，开始重新探讨屈原故里，向屈原故里传统说提出了挑战，提出了屈原故里汉寿说。最先提出屈原出生地为湖南汉寿的学者并不是汉寿人，谈不上是为了发展家乡的旅游文化经济，而是为了探讨历史真相，进一步弘扬屈原爱国爱乡的精神。

楚文化遗址及墓葬的发现

常德市文物局副局长王永彪在《屈原故里“汉寿说”的考古学观察》一文中说，“汉寿境内的楚墓至少在万座以上”。在“沅澧二水流域发现楚



国古城 15 座”，而汉寿境内就有确定为汉代的索县城、西湖砖厂古城和文献记载为宋代的黄诚寨即皇城港古城。但周围发现不少汉代古墓，且离地表层 50 公分发现战国夹砂红陶；都有可能早于汉代。特别是索县城，湘西里耶出土简中就提到索和洞庭郡等的名称，西洞庭尾间索县古城附近就发现大量战国古墓。屈原“朝发枉渚（德山），夕宿辰阳”在汉寿境内，辰阳就很可能是西汉的索县城。东汉阳嘉三年（134）又改索县为汉寿县。汉寿自古以盛产绳索闻名于楚，屈原《楚辞》中也多次提到索，如“索琼茅以筮等兮”，“索胡绳之緼緼”，直到“上下而求索”内涵的深化。加之古汉寿有辰阳港、辰河水、辰阳界、辰阳障、辰阳镇等地名，因而“汉寿即楚辰阳”，屈原从德山到辰阳在古汉寿境内可信。

西洞庭湖沅水尾间的沧港即沧浪之水交汇处，被认定为屈原故里汉寿说的具体地点。原汉寿县文物所长刘正芳和一些学者以沧港为中心，认定洞庭湖畔应是屈氏家族“极目千里”的封地。春秋楚康王时的令尹屈到，据《太平寰宇记·朗州》卷 118 记载，喜欢吃府城城郊白马湖的菱角，便在湖畔专门修建了采菱亭。并要求儿子死后一定要用白马湖的紫菱祭他。陈致远先生认为，屈到筑采菱亭，“说明常德、汉寿一带应是屈氏家族的封地屈地”。离汉寿 7 公里的沧港镇，距沅水故道不足一里，附近有青泥湖、黄泥湖、七星堆等遗址。古镇有天乙宫、濯缨桥、屈原巷、三闾大夫祠、江潭坪、屈原庙、清斯亭、沧溪寺、钓鱼台等许多遗址遗迹。距沧港西南 1 公里的熊家铺村的《熊氏家谱》明确记载“他们的祖先是楚武王的后裔”，挨近沧港聂家桥的熊家坪的熊姓人，“与沧港熊姓同宗同祖”，距沧港西北 1.5 公里原祝家岗凤形山，发现战国早中期楚墓群 100 余座，已挖掘 80 多座，出土文物 200 多件，大部分为生活、祭祀的陶器，也有铜镜、带钩等少量的青铜器出土。距沧港西南 2.5 公里原聂家桥乡老河堤，集中了战国中晚期楚墓群 1000 多座；以青锋山、武峰山古墓群最为著名，抢救性发掘出青铜器、漆木器、铁器、彩陶等 100 多件，其中鹿角铜镜、龙凤纹镜为国家一级文物，特别是今藏于湖南省博物馆的楚国郢都护卫长官的郢室畏户之钺（钺）铜印，与楚王室有着必然的关系。公元前 704 年楚武王称王后，来汉寿筑皇城开濮地得到考古发掘的证实。至今这里还有武王庙、白马寺、皇城港、花园坪、皇家花园村等地名。

从沧港往东，沿沧浪水约 6 公里或早路 7.5 公里是汉寿古城，很可能



就是屈氏家族的莫敖府，也就是《鄂君启节》铭文中的“木关”即近似音的“莫关”。在电力新村发现战国早中期楚墓群，以周边南湖田家洲遗址和西湖“塔园古文物遗址”最著名，其年代遗址商周至明清时代，出土了青铜镜、陶盆、陶盘、陶豆和汉代瓦当等一批珍贵文物，西竺山乡西湖村亦出土了商周到西汉瓦当。距沧港不到 10 公里的岩嘴乡，亦发现楚墓群遗址。沧浪水源头之一的三和乡宝塔铺村，2002 年出土西周王室朝廷独有的湘西北唯一的“镇县之宝”青铜铙 2 枚。特别是东岳庙乡发现大型楚墓群 20 多处，多达 300 座，出土了高官印玺、图章和礼器、兵器、乐器等 3000 多件。刘子英在《屈原与汉寿县之沧浪》《楚王室后裔在鹿溪》中认为，丰家铺乡鹿溪，处于汉寿、桃江县接壤山区，楚亡后成为五六百楚王室成员隐匿的世外桃源。两处的关山，以鹿溪为中心成南北拱卫之势。在秦汉强徙楚王室屈、景、昭三大族时，许多人不愿远离故土，或隐匿深山，或改换姓氏。汉寿县沧浪水周围一带源于熊姓的屈氏多改称熊氏，并不断繁衍发展，故“至今汉寿境内熊氏颇多，聚族而居者便有丰家铺乡熊氏，朱家铺乡熊家铺熊氏，沧港镇七星堆熊氏，聂家桥乡熊家村熊氏，龙阳镇熊氏，西港镇熊氏，”还有沧港祝家岗熊氏。而且，“以汉寿为中心，在周边各县市也有不少聚族而居的熊氏，如常德县全家坪熊氏，桃源县陬市熊氏，桃江县乌旗山熊氏，三堂街熊氏，安化县梅城熊氏……仅汉寿和桃江两县熊氏便有五万余人”。^①认为“凡熊氏者，都属楚王后裔，并包括由熊氏演变为屈、景、昭等 68 氏”。

尤其是与沧港毗邻株木山乡的战国楚墓群，在东西宽 4 公里，南北长 6 公里的丘陵地带，据 1995 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常德地区·文物志》第 68、69 页“株木山楚墓群”条，在这儿发现了大小 1000 座楚墓。1985~1987 年，为配合砖厂建设，考古人员在株木山全赋村发掘楚墓 84 座，出土器物 600 多件，主要有武王之童督戈、空首青铜剑、错银云纹青铜矛、部分生肖铜印（包括王字凤鸟纹肖形铜印）、宫綦铜印、虎纹王字铜印、连器铜印、青铜仙人镜、青铜山字镜、青铜铸纹铃、黑陶彩勺、陶豆、箏床和内外三层楠木套棺巨墓出土的瑟、玉佩、皮鼓、天平秤、青铜

^① 刘子英：《楚王室后裔在鹿溪》，载施隆庭主编《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第 13~18 页。

镢、四山镜、漆木镇墓兽等都是极为珍贵的文物，尤其是彩绘木俑服饰还引起英、美西方专家亲来考察。正是株木山大量楚文物的出土，才使一些学者结合屈赋、史志等最先提出屈原故里汉寿说，向传统的秭归说提出了挑战。

屈原故里汉寿说最早提出的学者和众多学者的共识

第一个发表《屈原的出生地在湖南汉寿》的学者是湖南一师的学者黄露生先生（湖南醴陵人），并非常德汉寿人。此文在《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发表后，不久为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心《先秦·秦汉史》转载。黄先生认为“武王之童督”是楚武王授给儿子屈瑕以莫敖身份统率军队的“尚方宝剑”（后有人误解，改为“尚方宝戈”）。公元前704年，熊通“自立为楚武王”，儿子“受屈”，屈瑕成为屈氏家族的始祖。屈瑕与楚武王“始开濮地而有之”（《史记·楚世家》）。武王将所“开濮地”封给屈瑕。屈与濮同韵通假，濮地即屈地，“指当时的洞庭地区”。汉寿一带就是“著封”的“屈氏家族封地‘屈’地区中心”。与沧港紧邻的聂家桥乡楚墓出土的“郢室畏户之鉢（玺）”铜印系楚国郢都护卫长官之印，很可能是执政官在都城失陷后带至汉寿一带死后葬在墓中的，也说明龙阳一带是楚王室的封地，此印的长官可能就是屈氏要人。我们也认为“郢室畏户之鉢（玺）”鸟纹青铜印，是楚武王选择汉寿县筑皇城开濮地时，就设有护卫皇城的机构及其长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①。黄先生结合屈赋分析，认定屈原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沅湘地区度过的，楚国的屈地又在“沅湘”地区，屈原谈自己的故乡也是返归“沅湘”地区，加上汉寿众多纪念屈原的文物，从而得出了“屈原出生于湖南汉寿是可以肯定的”^②结论。

新世纪伊始，随着旅游文化产业的兴起，一些学者特别是汉寿的学者，对屈原故里出现秭归说、郢都说、湘阴说、巴陵说、奉节说、汉寿说等多种说法，至少向传统的秭归说提出了挑战。而能从考古发掘文物印证屈赋、方志等文献自圆其说的是汉寿说，以侯文汉为首的一批学者，开始

① 江年国、韩隆福：《楚武王汉寿筑皇城开濮地》，载《常德日报》2018年3月17日。

② 黄露生：《屈原的出生地在湖南汉寿》，载《武陵学刊》1997年第5期。



主办一年1期的《屈原研究》年刊，意在弘扬屈原忧国忧民爱国爱乡的精神。该刊出版4期以后，汉寿县于2005年、2006年相继成立了以侯文汉为会长的屈原学会和以潘惠为所长的屈原故里科学研究所，并积极参与了香港、杭州、深圳和一些地方主办的国际、全国、省地屈原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县委、县人大、县政协支持下，组成了县内外、省内外一支上百人的学者研究队伍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汉寿县政协还于2004年、2008年先后出版了《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屈原与汉寿》两书共约70万字。如果说《汉寿历史典故与传说》，只是收录了部分有关屈原的文章与传说，那么作为“汉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的《屈原与汉寿》，则收集了省内外100余人次倾向于屈原故里汉寿说学者的文章，综合了近年来汉寿说的主要成果，同样弘扬了屈原爱国爱乡的精神。该书包括“学界专论”（42篇）、“古迹寻踪”（纪念遗迹、地名胜迹、沅澧遗址43处）、民间传说（30个）、“诗赋遗证”（古今41人诗作）计40万言。2009年汉寿县屈原学会、诗词学会又与湖南省诗词协会举办了首届“屈原杯”全国诗词大赛，参赛的300余人，从5518首诗稿中评出一等奖2名、二等奖6名、三等奖8名、优秀奖124名。6月26日，来自北京、上海、河南、山西、湖北、台湾等地200多位代表参加了颁奖大会，湖南诗词协会敬献了《梅花图》和《屈子遗风》题词，弘扬了屈子爱国爱乡的民族精神。10月23日，汉寿屈原学会又承办了湖南省屈原学会年会。2009年年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收到论文43篇，印发了30万字的论文集一部，使专家学者取得了屈原与汉寿有着密切关系的共识，并认定“屈原故里汉寿有一定的史学定位”^①。不少外省专家学者还亲到屈原故里进行了实地考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中国屈原学会会长方铭先生在《屈原与汉寿·序一》中说，以“东方朔《七谏》说‘平生于国兮，长于原野’，国为国都，因楚国称王坐大，在春秋时即有封国，到战国时，未必只有楚国都城可以称为国。另外，战国时期，楚国受到秦国的压迫，都城也在不断地迁徙，所以，如果一定说屈原出生在楚国都城，或者一定指都城为江陵，就可能有把问题简单化的嫌疑”^②。他指出汉寿县近几年不仅多次举办屈原学

① 《2009年湖南省屈原学会暨屈原与湖湘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方铭讲话》第3页。

② 方铭：《序一》，载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1页。

术研讨会和座谈会，“而且，还做了大量文物考察和普查工作，在汉寿县境内找到了多处与屈原有关的文化遗存；又从民间搜集了40余种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重视考古工作，发现楚墓1800余座，出土文物1000多件，这些文物大部分集中在沧浪水两岸。汉寿出土的文物之中，比较有名的有‘武王之童督戈’、‘郢室畏户之玺’、‘连器之印’等60余件，这说明汉寿在楚国历史上，确实有非常重要地位”^①。湖南省屈原学会会长、湖南大学文学学院院长郭建勋教授在《序二》中也说，在浙江大学2007年“楚辞国际研讨会”上，世界汉诗协会常务副会长、杭州的钱明锵教授的《〈渔父〉沧浪地理位置之究索》论文中说：“用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考证沧浪水在汉寿，这本身就排除了地方主义的功利立场”。他认为，《屈原与汉寿》书稿，是“研究成果的汇集，也可以说是阶段性的总结”。因为，这里已提出了迄今屈原祖籍汉寿说的主要依据。

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屈原故里说的主要依据

一是出土的不少文物是汉寿为中心的洞庭屈氏家族封地的硬件。据《左传》《战国策》《淮南子》《史记》《资治通鉴》及王逸《楚辞章句》等相关资料，楚武王与邓曼生屈瑕封莫敖。屈瑕与楚武王“始开濮地”，受封于屈邑。屈瑕“食邑于屈，因氏焉”（《元和姓纂》），明确指出屈原直系祖先屈瑕的封地就是屈原的故乡。汉寿株木山武王之童督铜戈、连器之印、虎纹王字印等的出土，也证明汉寿就是屈原的故乡。虎纹王字印是调用军队的有关凭证。连器铜印即连敖之印，屈匄大將軍就是连敖。张震泽《楚莫敖考》认为，“楚国之敖，义盖表示尊崇，略如后世匈奴之单于，西域之可汗”^②。敖、器古代通用，连器即连敖之铜印，为楚国掌管军事官员的军玺。武王之童督戈是楚武王赐给儿子屈瑕的尚方宝戈，说明汉寿一带是屈氏祖籍“著封”的中心，是与楚王同姓最显赫的家族享有“极目千里”的封地和“千乘”军队，涵盖洞庭周围的常德沅澧流域各县和资江益阳、湘江长沙、湘阴、汨罗、岳阳等广大地区。有位罗敏中先生却断章取

① 方铭：《序一》，载侯文汉主编《汉寿屈原故里考》，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1~2页。

② 张震泽：《楚莫敖考》（载《东方杂志》第42卷第15期），转引自何光岳《楚源流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319页。



义，置同在株木山发掘出来的连敖屈匄之印与武王之童督戈割裂开来，在《湖南日报》2010年10月3日发表《此武王非彼武王》，硬说楚武王是秦武王。作者明明知道湖南一师黄露生教授发表《屈原出生地在湖南汉寿》中言“武王之童督”戈是楚武王授予自己军队统帅的“尚方宝剑”，“是代表武王在这一带行使至高无上权力的权柄”。其意是强调此戈的重要性，黄先生后来发表的文章中早已改成“宝戈”，可作者在一篇除引用他人的原文仅几百字的文章，仍花了几百字说：“常识告诉我们，尚方宝剑，不会是戈，且诸侯王又是否有资格授其臣下尚方宝剑呢？把武王之童督戈认为是尚方宝剑，是说过去的。其实尚方宝剑一词，在秦汉时才出现，之前连少府尚方令、尚方丞等官制官职都没有，尚方宝剑这一说也就不可能有，又何来楚武王赐其子屈瑕尚方宝剑之事呢？”^①接着，又引杨启乾《汉寿出土武王之童督戈考》认定，“此戈制作年代属于战国中晚期秦武王时期”，再引沈融就怀化中方乡恭园村出土之戈发表的《武王之童督戈考》来套用于汉寿之铜戈，亦说成秦武王，断定“到目前为止，汉寿出土文物也没有一件与屈原直接挂钩”^②。这就忽视了连器即连敖屈匄之印与武王之童督戈在株木山全赋村同一个地方出土，屈匄是屈原之叔父，屈原又是为公元前312年丹阳之战牺牲的屈匄等八万将士招魂祭祀，又在秦武王即位之前楚墓里，怎么可能会是秦武王之童督戈呢？又怎么能说没有一件与屈原有关呢？而秦武王（公元前310～前307）在位不到四年，他即位，屈氏家族因屈匄等八万将士丧尽已由盛转衰，次年屈原将连敖将军屈匄“连器之印”和“武王之童督”戈葬于株木山全赋村祖墓，“魂兮归来哀江南”，即拉开了楚国悲剧的帷幕，又揭开了屈氏家族衰微的序幕，也预示了屈原的悲剧。此时秦武王尚未登基，又何来秦武王之童督戈呢？更何况秦武王公元前307年8月已举鼎而死。春秋战国，除熊通生前僭号为楚武王外，其他均是死后之谥号，秦武王不可能死后铸造生前之童督戈。死人不可能铸造死后谥号之童督戈，除非有文献证明。况且，杨文与沈文各一千多字的文章对“童督”的解释和督字的写法也不相同。杨文以童、重谐音，督是督造，把铜戈变成了陕西重泉故城督造的秦武王督造的铜戈，并

① 罗敏中：《此武王非彼武王》，载《湖南日报》2010年10月3日。

② 罗敏中：《此武王非彼武王》，载《湖南日报》2010年10月3日。



认定“楚国铭文的特点是‘物勒主名’，而秦国的铜戈则是‘物勒工名’，即此戈属于战国中晚期秦武王”。沈文则认为“童”的本义为男性奴仆，且“直接隶属于最高统治者（秦）武王”。沈文把“物勒主名”说成秦武王，与杨文解释相矛盾。尽管沈文为自圆其说，认为商鞅始创“物勒工名”制，到秦武王由于尚武、排外倾向，“物勒工名制度有可能在他统治期间遭到废除”。这种“推论”出来的“可能”，也实在没有说服力。而且沈文是就怀化中方乡恭园村出土的铜戈而言，且“武王之童督”与常德汉寿株木山全赋村出土的“武王之童督”的督字写法也不相同。即使涵义相通，一个帝王特别是只当了三年多的秦武王，也不可能用不同的铭字。又怎么能用怀化的“武王之童督”去代替汉寿的“武王之童督”呢？如果硬要讲涵括的话，怀化、汉寿出土的铜戈既然都有楚国“物勒主名”的特点，而汉寿同地同时出土的带有连敖屈匄铜印、虎纹王字军玺等许多楚文物出土，那也只能是汉寿的楚“武王之童督”戈适用于怀化的“武王之童督”戈。至于罗文原在屈原国际研讨会上所说“秦、楚两国都有武王，但楚武王在位时间须早到春秋初期”，与400年后的“时代特征不符，应予排除”的说法更站不住脚，春秋时的铜戈不仅可以在战国时出现，还可在更后乃至今天出现，正如商代甲骨文在清代出现一样。而且，春秋初年楚武王所赐莫敖和武王之童督戈，只要屈氏还世袭莫敖的尊荣，几百年间即使丢失了，屈氏家族可以再铸，包括按战国时形制铸造武王之童督戈。只有当屈氏家族在连敖屈匄八万将士死于丹阳，象征屈氏家族荣尊的武王之童督戈在屈家走向衰败的时候，屈家才将武王之童督、虎纹王字军玺等一同与连敖（屈匄）铜印一起葬入株木山屈家祖坟。至于罗敏中先生引沈文“秦武王三年”秦伐楚，也是为我所需。沈文言“秦武王三年（公元前208年，有争议）”，而罗文却删掉了括弧中“前208年，有争议”的内容。因为秦武王三年是公元前308年，沈文说是“前208年”。如不是误后百年（公元前221年秦已统一中国），也是搞错了历史年代。公元前312年，秦、楚丹阳之战、蓝田大战，楚国惨败，“败亡汉中，兵挫蓝田”^①，由盛转衰。秦武王三年（公元前308），为孤立韩国、争取楚国中立，派冯

^① 《史记·楚世纪》。